

明长城砖砌空心敌台类型与分期研究*

——以“蓟州镇”、“真保镇”为中心

张依萌

内容提要 本文以历史文献中所提及的明长城“蓟州镇”、“真保镇”为考察范围，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地域内的 1083 座明长城砖砌空心敌台进行分析，按其内部结构的不同为标准划分为 17 个类型，并发现各类型空心敌台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，蓟镇空心敌台流行三券室三通道结构，而真保镇的空心敌台则以中心室外回廊结构为主。此外，通过对两镇所发现的明长城纪年题刻进行梳理，并与明代文献对照，将砖砌空心敌台分为三期。

关键词 明长城 空心敌台 类型学 蓟州镇 真保镇

一 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材料的使用

砖砌空心敌台^①，指建立于明长城墙体之上，用于驻军、储藏兵器和对敌战斗的碉堡式建筑。它们数量众多、形制多样，是明长城考古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
“空心敌台”为明人对此类建筑的自名，与我们通常所说的“烽火台”结构与功能不同。敌台主要指建筑于连续墙体之上的堡垒式建筑，而烽火台大都是独立于墙体的单体建筑，作为联系长城墙体与内地指挥机构、驻军设施的通信预警设施。具体差异详见后文。

明长城砖砌空心敌台，以华北地区现存数量最多。目前已经发表的明长城调查材料，以东起河北山海关老龙头，西至北京怀柔汴连口；东北起门头沟沿河口，西南至山西平定鹿路口的两段最为系统、全面。这两段明长城即明代文献所称“蓟州镇(或蓟镇)”(大体包括今北京东部的怀柔区、密云区、平谷区，河北省东部的承德市、唐山市、秦皇岛市)、“真保镇”(大体包括今北京西南的门头沟区，河北省西南部的保定市、石家庄市、邢台市)^②。本文即以这两段明长城沿线分布的砖砌空心敌台为研究对象。为行文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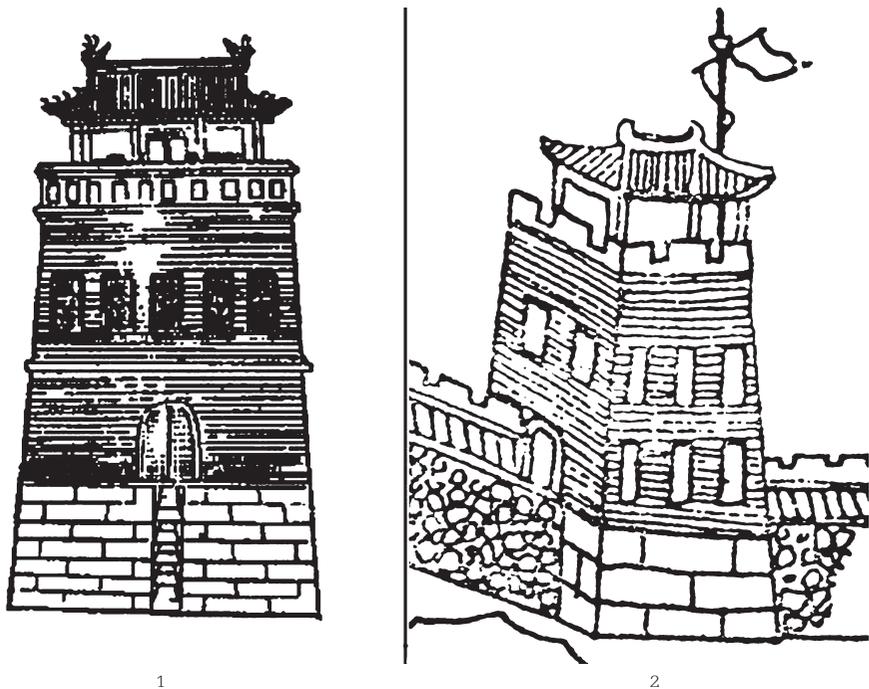
*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《全国明长城资源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》(项目编号: 18ZDA223)、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《明代蓟镇长城防御体系考古学研究》(项目编号: 17LSC009)的研究成果。

① (明)戚继光:《练兵实纪》页109, 中华书局, 2001年。

② (明)刘效祖:《四镇三关志·制疏考》,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明万历四年刻本, 1991年。

〔图一〕部分明代文献所见“空心敌台”图样

1. 采自(明)刘效祖:《四镇三关志·制疏考》,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明万历四年刻本,1991年
2. 采自(明)戚继光:《练兵实纪》页109,中华书局,2001年



便,以下采用文献说法,称“蓟镇”、“真保镇”(图一、图二)。位于北京市、河北省西北部的“宣府镇”(大体包括今北京市延庆区、河北省张家口市)及北京市昌平区一带的“昌平镇”也是明长城的重要军事单元,但由于材料目前发表较少,不成系统,故暂不拟对其进行讨论。

蓟镇的砖砌空心敌台研究材料,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,沈朝阳^{〔1〕}、张立辉^{〔2〕}、李占义^{〔3〕}、张保田^{〔4〕}等人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^{〔5〕}、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^{〔6〕}、天津市明长城资源调查队^{〔7〕}已公开发表的最新长城资源调查数据为主。真保镇的材料,则有北京市长城资源调查队^{〔8〕}、保定市文物管理所^{〔9〕}、河北省明长城资源调查队^{〔10〕}以及刘建华^{〔11〕}等人的调查成果。

此外,我们对河北省境内部分明长城段落进行了实地踏查,并做了修正和补充。通过对以上材料的

〔1〕 沈朝阳:《秦皇岛长城》,方志出版社,2002年。

〔2〕 张立辉:《山海关长城》,文物出版社,1990年。

〔3〕 李占义:《抚宁长城》,五洲传播出版社,2005年。

〔4〕 张保田:《追寻远去的长城》,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2年。

〔5〕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:《明蓟镇长城1981—1987考古报告》,文物出版社,2012年。

〔6〕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、密云县文化局:《司马台长城》,燕山出版社,1992年。

〔7〕 天津市文物局、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、天津市明长城资源调查队:《天津市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》,文物出版社,2012年。

〔8〕 门头沟区长城资源调查队:《门头沟区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》,北京文博网<http://www.bjww.gov.cn/2011/3-28/1301283793078.html>,2011年。

〔9〕 孙刚、赵春明:《涞源明长城调查报告》,《文物春秋》1999年第3期。

〔10〕 河北省文物局、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、河北省长城资源调查队:《河北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·涞源卷》,文物出版社,2010年。

〔11〕 刘建华:《张家口地区明代长城调查综述与分析》,《文物春秋》1990年第1期。

综合统计，文章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内，共确认形制可辨的砖砌空心敌台1083座。

二 砖砌空心敌台的类型学分析

（一）砖砌空心敌台的类型

明长城砖砌空心敌台，外观相似，均为石基础上建砖结构，通向墙体马道的方向设门，四周设有箭窗，外壁向上略有收分，台顶四周设垛口。但其内部结构富于变化。根据砖砌空心敌台内部结构的不同，可以将其划分为如下类型^①：

A型

木梁架型。内部空间由木柱与楼板搭建而成。根据楼层数，可分为两个亚型：

Aa型：双层，内部空间为单层。

如：古北口台1号，俗称“敞楼子”。基宽东西11.8米、南北9.8米，高11米。四壁残留木柱槽，室内中部有四个柱础〔图二：1〕。二道梁台20号，俗称“四眼楼”，基宽东西10.9米、南北11.36米，高11.2米。东、南墙各设一门二箭窗，西、北墙各设四个箭窗。四壁各残留木柱凹槽四个。

Ab型：三层，内部空间为双层。

如：古北口台13号，俗称“敞楼”。基宽南北12米、东西11米，高13.2米。东墙设一门二箭窗，南、北各三箭窗〔图二：2〕。古北口台21号。基边长10.4米，高6米。西、南墙各一门二箭窗，东、北墙各残留一箭窗。

B型

券室通道型。内部为券室和通道垂直相交的结构。台顶一般有房址。根据券室与通道的数量不同，可分为多式：

Ba型：单券室。

Ba型 I 式：方券室。如：义院口台77号，俗称“花楼”。基宽东西9.3米、南北9.5米，高9.5米。东墙设一门，南、北、西墙各一箭窗〔图三：2〕。二道梁台58号，俗称“两眼楼”、“棒槌楼”、“仙女楼”。基宽东西5.8米、南北4.7米，高10.5米。东、西墙各一门，北墙二箭窗。

Ba型 II 式：单券室单通道（“十”字型）。如：白马关台32号。基宽东西8.7米、南北7.5米，高7.3米。东墙设一门，余三面各一箭窗〔图三：1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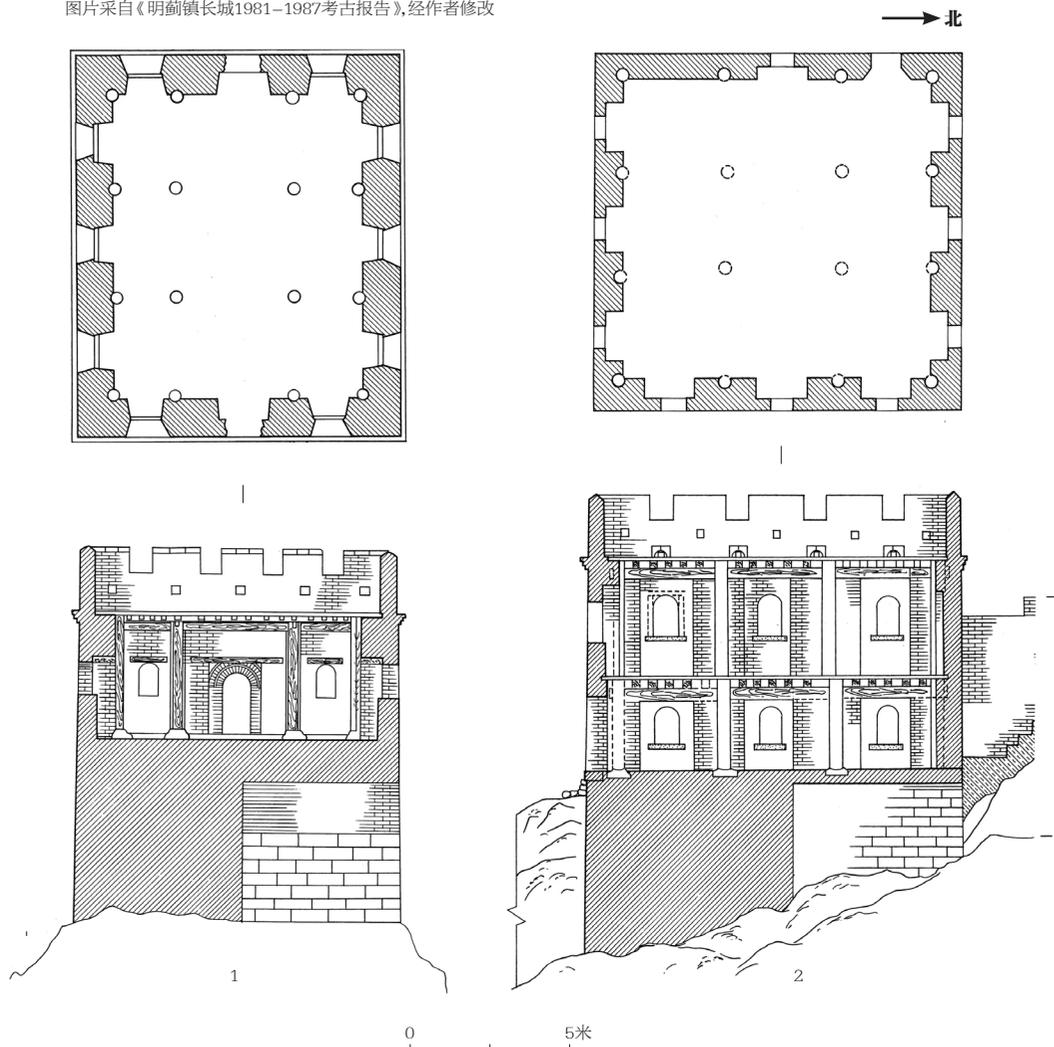
Bb型：双券室。内部有1至5条不等的通道。

Bb型 I 式：单通道（平面“H”字型结构）。如：九门口台1号，俗称“高楼”。基宽9.6米，通高11.4米。西墙设一门一箭窗，余三面各二箭窗〔图四：1〕。九门口台11号。基宽东西9.5米、南北9.5米，高9.45米。西墙设一门二箭窗，余三面各二箭窗。

① 未注明出处的标本均来自前揭《明蓟镇长城1981—1987考古报告》。

〔图二〕A型空心敌台内部结构平面图

图片采自《明蓟镇长城1981-1987考古报告》，经作者修改



Bb型Ⅱ式：双通道（平面“井”字型结构）。义院口台9号，俗称“石门楼”。基宽东西7.6米、南北8米，通高9.4米。东西两墙各一门一箭窗，余二面各二箭窗〔图四：2〕。哨楼5号。基宽东西9.6米、南北6.6米，高9.1米。北墙设一门二箭窗，南墙设三箭窗，东、西各二箭窗。

Bb型Ⅲ式：三通道。前甘涧长城1号敌台^{〔1〕}。石基础高4.0米，基边长6.8米，残高7.8米，收分0.4米〔图四：3〕。九门口台25号，俗称“三道楼”。基宽东

西6.67米、南北6.23米，高6.85米。南墙设一门二箭窗，北墙设三箭窗，东、西各二箭窗。

Bb型Ⅳ式：四通道。义院口台74号。基宽东西12.3米、南北7.25米，通高9.4米。东西墙各一门一箭窗，南北墙各四箭窗〔图五：5〕。二道梁台49号。基宽东西13.7米、南北8.4米，高12米。东、西墙各设一门以箭窗，南、北墙各四箭窗。

Bb型Ⅴ式：五通道。如：二道梁台30号，俗称“五眼楼”。基宽东西14.6米、南北9.7米，通高12.2米。东西墙各一门一箭窗，南北墙各五箭窗〔图四：4〕。

Bc型：三券室。内部有1至5条不等的通道。

Bc型Ⅰ式：单通道。如：大水峪台30号。基宽东西5.8米、南北14.25米，通高10.4米。西墙设一门一

〔1〕 前揭《天津市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》页29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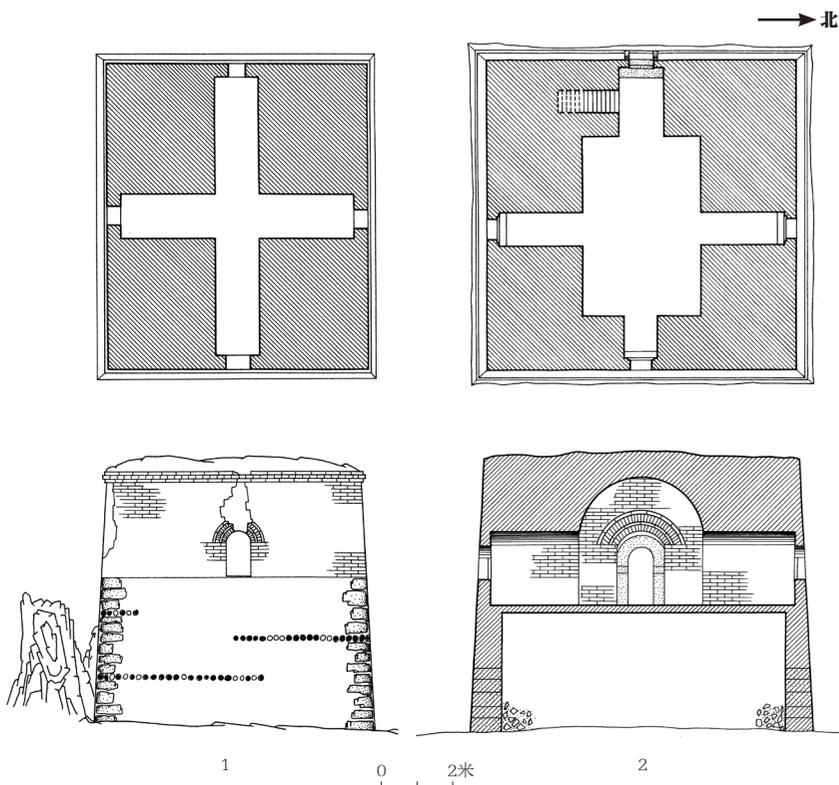
箭窗，东墙三箭窗，南北各二箭窗〔图五：1〕。黄土岭台130号，俗称“东二楼”。基宽东西10.2米、南北6.8米，高9米。东、西墙各一门以箭窗，南、北墙各三箭窗。

Bc型Ⅱ式：双通道。如：墙子路台58号。基宽边长10.7米，通高11.2米。东西墙各一门二箭窗，南北墙各四箭窗〔图五：2〕。古北口台11号。基宽东西8.4米、南北12.4米，高9.7米。南、北墙各设一门以箭窗，东、西墙各设三箭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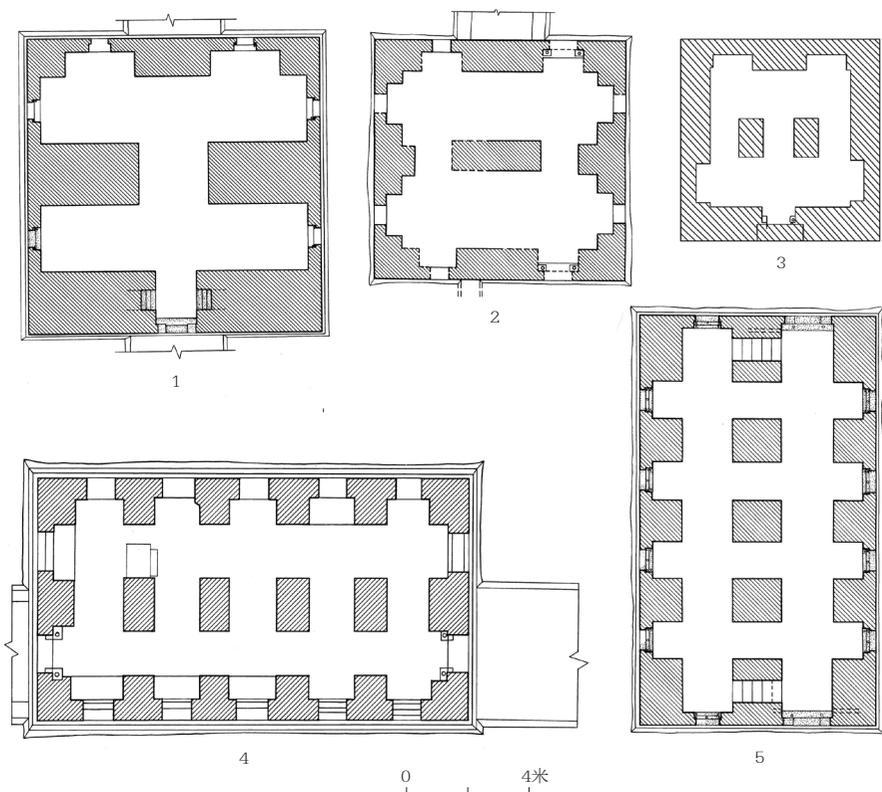
Bc型Ⅲ式：三通道。最为常见。如：潮河西北支台2号。基宽东西9.7米、南北10米，通高9米。南、北墙各一门二箭窗，东、西墙各三箭窗〔图五：3〕。二道梁台3号。基宽东西10.55米、南北10.2米，高5米。南、北墙各设一门二箭窗，东墙四箭窗，西墙三箭窗。

Bc型Ⅳ式：四通道。如：东峪沟附边敌台3号，俗称“四眼楼”。基宽东西9.6米、南北11.5米。通高11米。南北墙各一门一箭窗，东、西墙各四箭窗〔图五：5〕。二道梁台44号。基宽东西12.9米、南北7.8米，高14.5米。东墙设一门，南墙设一门三箭窗，西、北墙各三箭窗。

〔图三〕Ba型空心敌台内部结构平面图
图片采自《明蓟镇长城1981—1987考古报告》，经作者修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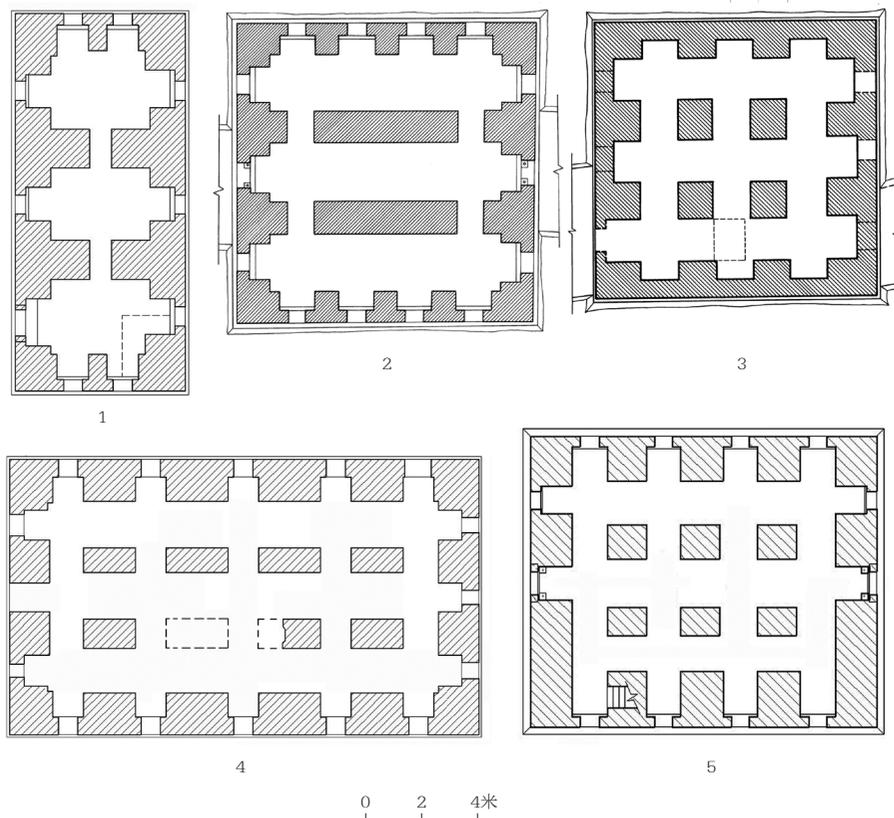


〔图四〕Bb型空心敌台内部结构平面图
图片采自《明蓟镇长城1981—1987考古报告》，经作者修改



〔图五〕Bc型空心敌台内部结构平面图

图片采自《明蓟镇长城1981—1987考古报告》，经作者修改



Bc型V式：五通道。九渡河镇二道关村西267号敌台^{〔1〕}。基宽东西9.5米、南北16.3米，通高8.32米。南墙设一门二箭窗，北墙三箭窗，东西墙各五箭窗〔图五：4〕。

C型：中心室外回廊型（平面“回”字型结构）。台中心为开四门券室，四周有回廊围绕。根据中心室顶部结构，可分为三个亚型：

Ca型：中心室为木梁架结构，不起券。如：二道梁台51号。基宽东西11.4米、南北10.4米，通高14米。东、西墙各一门二箭窗，南北墙各三箭窗〔图六：1〕。涿源211

敌台^{〔2〕}。基宽东西10.377米，东侧底至拔檐下皮高8.86米。南、北墙各设一门二箭窗，东、西墙各设四箭窗。

Cb型：中心室为券顶，平面呈矩形。如：二道梁台28号。基宽东西、南北各10.25米，通高10米。南、北墙各一门二箭窗，东、西墙各三箭窗〔图六：2〕。九门口台14号。基宽东西10.1米、南北9.75米，高10.35米。北墙设一门，南墙设一门二箭窗，西墙设三箭窗。

Cc型：中心室为攒尖顶或穹顶，平面呈八边形。如：二道梁台31号。中心室为穹顶。基宽东西10.5米、南北10.1米，通高13米。东、西墙各一门二箭窗，南、北墙各三箭窗〔图六：3〕。二道梁台32号。中心室为攒尖顶。基宽东西11米、南北10.1米，通高10.5米。东、西墙各一门二箭窗，南、北墙各三箭窗〔图六：4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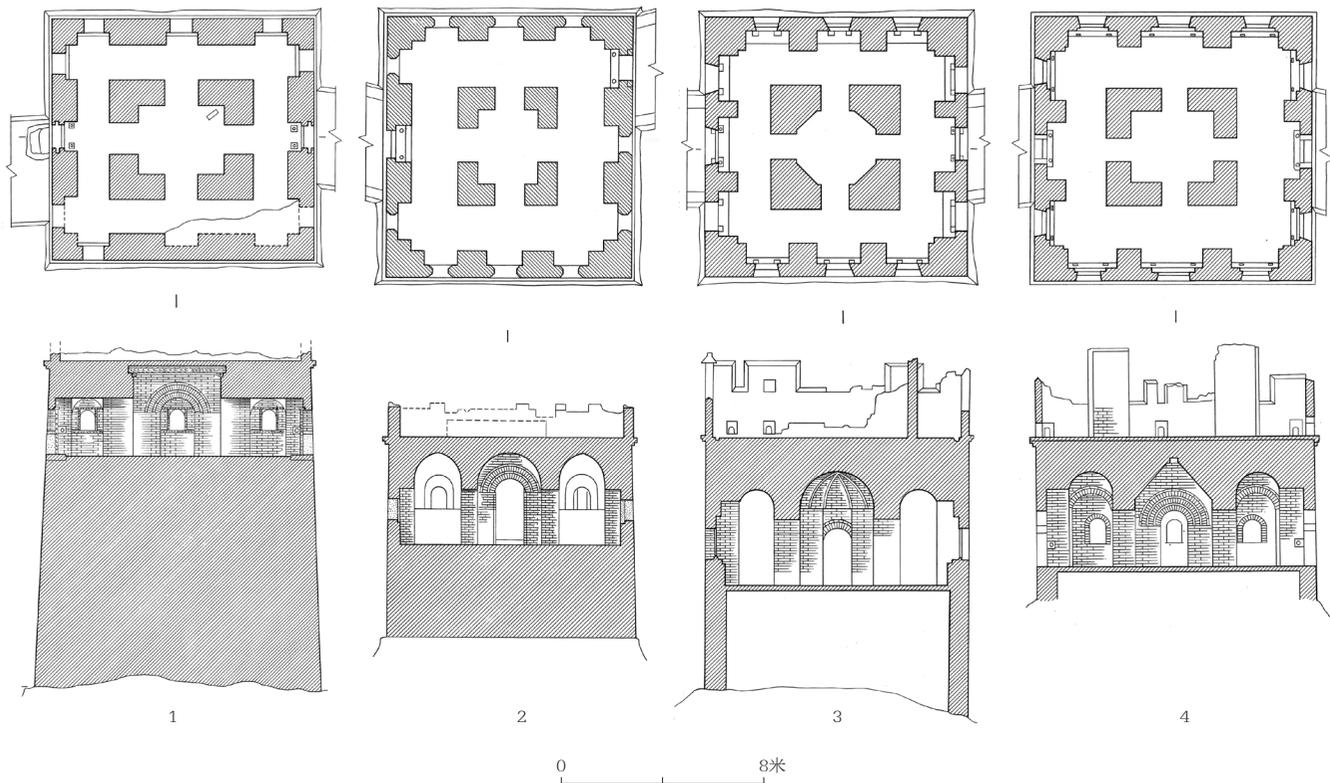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还有一些形制较为特殊的敌台，数量很少。如：黄土岭台134号，俗称“大尖楼”。基宽东西9.45米、南北9.5米，高9.8米。东、西墙各一门二箭窗，南、北墙各三箭窗。内部中心一东西向通道，南、北各有三个尺寸相当的券室并排分布。券室之间无通道。券室南北长2.06米、东西宽1.8米，高3.65米〔图七：1〕。

〔1〕 国家文物局：“长城资源保护管理信息系统”，<http://www.greatwallheritage.com>，2016年。

〔2〕 前掲《河北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·涿源卷》，页435。

[图六] C型空心敌台内部结构平面图

图片采自《明蓟镇长城1981-1987考古报告》，经作者修改



墙子路台94号，俗称“松树楼”。基边长10.8米，高8.05米。东墙设一门二箭窗，南、北、西各三箭窗。内部中心一东西向通道，南、北各有三个尺寸相当的券室并排分布。券室之间亦有通道相连券室南北长3.1米、东西宽2.65米，高3.55米〔图七：2〕。

徐流口台103号，俗称“头道洼楼”。基宽东西9.8米、南北10.3米，高9.3米。南墙设一门二箭窗，西墙设二箭窗，东、北墙各二箭窗。内部三券室东西并列。西、中券室之间为三通道，中、东券室之间为二通道〔图七：3〕。

古北口台12号。基边长13米，高11米。中部为木梁架结构中心室，外有一周回廊，回廊四边各有三个券门〔图七：4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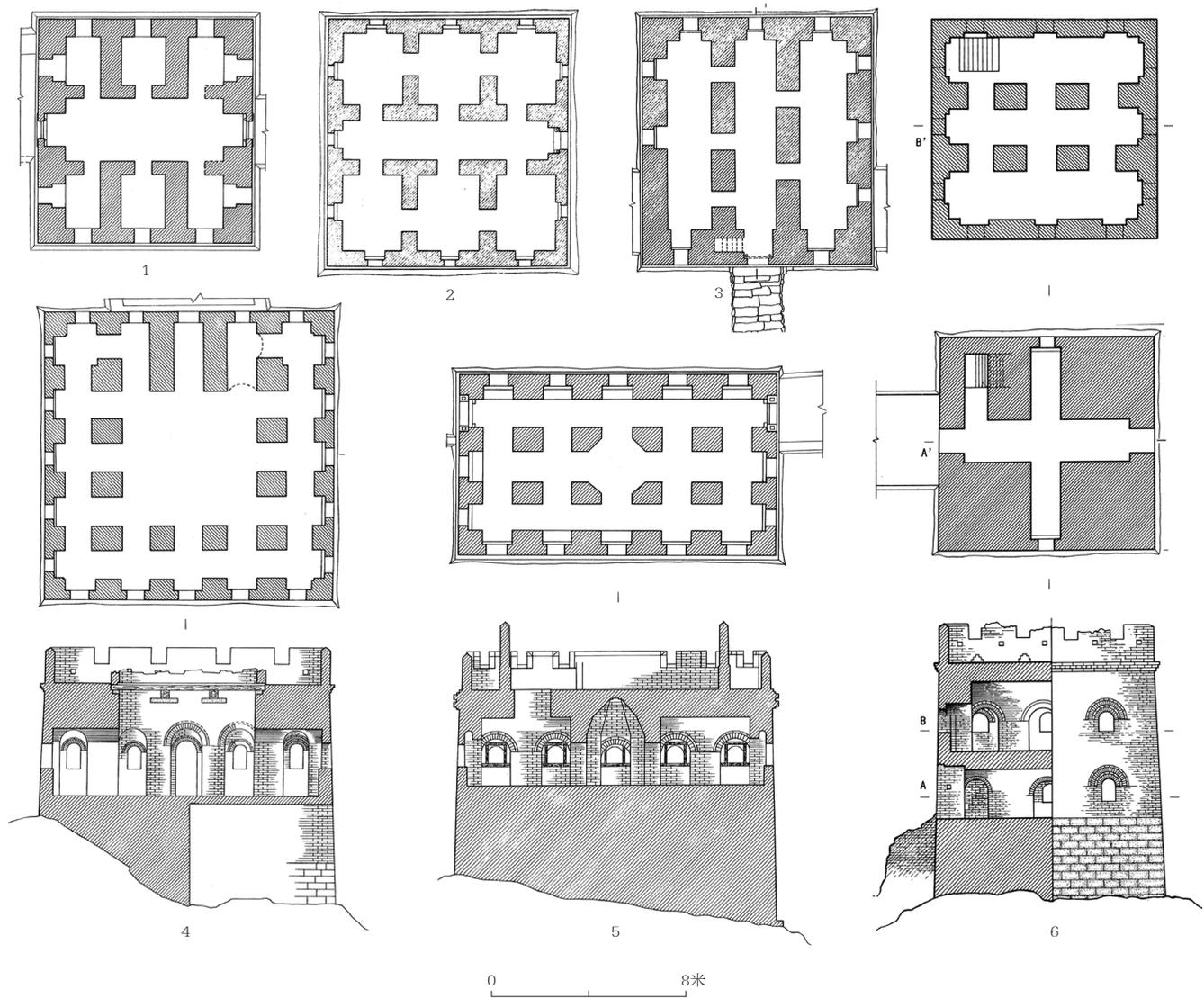
二道梁台55号。基宽东西13.5米、南北7.8米，高12.8米。内部结构为三券室五通道，中间有中心室，攒尖顶。东、西墙各一门二箭窗，南、北墙各五箭窗〔图七：5〕。

潮河西北支台3号。基宽东西10.2米、南北10.5米，高12.15米。楼体分上下两层。下层为“十”字型拱券，南、北墙各设一箭窗；上层为三券室三通道，四面各设三箭窗〔图七：6〕。

这些敌台虽然与A、B、C型敌台有一定差异，但大体可以判断，是脱胎于上述三个主要类型而来。如古北口台12号〔图七：4〕、二道梁台55号〔图七：5〕实为Ca型的两个变异型，而上述其余四件标本属于B、C二型融合而成。

〔图七〕特殊样式空心敌台内部结构示意图

图片采自《明劄镇长城1981—1987考古报告》，经作者修改



综上所述，明长城蓟州、真保二镇砖砌空心敌台根据内部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木梁架结构、券室通道结构、中心室外回廊结构三个主要的类型，其下又可细分为17个亚型。

（二）各类型敌台数量与分布特点

从空间分布上看，不同类型敌台的分布，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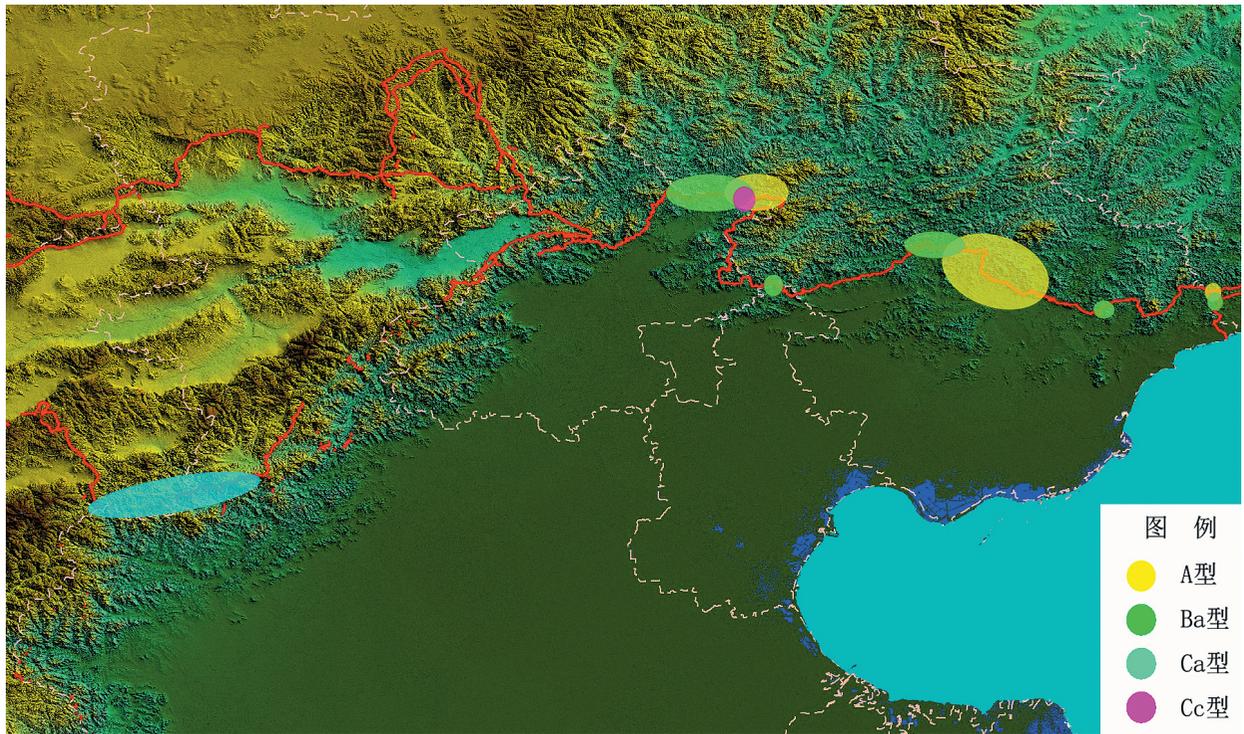
从数量与位置上看：

A型（木梁架型）敌台，在我们所讨论的1083座砖砌空心敌台中，仅发现46座，以司马台—金山岭、徐流口—小河口、九门口三段为中心集中分布。

B型（券室通道型）敌台数量占到绝对多数，达到777座，占全部砖砌空心敌台的72%左右。其分布范

[图八] 蓟州、真保二镇明长城A、Ba、Ca、Cc型敌台分布区域图 (作者绘制)

地形底图来源: NASA (美国太空总署)、NIMA (美国国防部国家测绘局), "The CGIAR Consortium for Spatial Information", <http://srtm.csi.cgiar.org/SELECTION/inputCoord.asp>, 2004.
长城分布数据来源: 前揭《明蓟镇长城1981-1987考古报告》插图折页



围最为广泛。Ba型敌台集中分布在义院口—驻操营、石门岔—潘家口、黄崖关、古北口一带；Bb型全部见于蓟镇；Bc型敌台则自山海关至滦源县全部可见；Bc型Ⅲ式敌台(三券室三通道)数量最多，达520座。

C型(中心室外回廊型)敌台也比较常见，共计发现260座。其中194座位于真保镇，余66座见于蓟镇。Ca型敌台共23座，除1座位于滦平县金山岭外，全部见于滦源县西南的太行山脉北端与燕山山脉西南段过渡地带；Cb型敌台占大多数，共有230座，58座位于蓟镇，172座位于滦源县；Cc型敌台仅7座，除一座位于抚宁县东部外，全部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一带[图八]。

综合来看，Bc型Ⅲ式、Cb型敌台为明长城砖砌空心敌台最主要的两种形式，总数分别占到全部砖砌空心敌台的48.4%和21.6%以上[表一]。

[表一] 蓟州、真保二镇明长城砖砌空心敌台类型数量统计表

类型	蓟镇	真保	合计
Aa	44	-	44
Ab	2	-	2
Ba1	45	1	46
Ba2	3	-	3
Bb1	9	1	10
Bb2	36	-	36
Bb3	71	-	71
Bb4	15	-	15
Bb5	4	-	4

(续表一)

类型	蓟镇	真保	合计
Bc1	4	-	4
Bc2	49	-	49
Bc3	505	15	520
Bc4	17	-	17
Bc5	2	-	2
Ca	1	22	23
Cb	58	172	230
Cc	7	-	7
合计	872	211	1083

我们看到，蓟镇所辖敌台包括了全部的16个类型；真保镇仅有5型。

从各类型敌台的分镇数量看，蓟镇以Bc型Ⅲ式敌台数量占绝对多数，达到505座，而其余15个类型的敌台数量均少于60座；真保镇以Cb型敌台数量最多，为172座，其余均罕见。

(三) 从敌台自名看敌台分区

明长城砖砌空心敌台券门之上，往往可见带有自名的砖石匾额。据统计，目前能够看到的蓟州、真保二镇中空心敌台自名匾额或石刻记录，共计57份。其中匾额31块，碑刻26通^①。

我们从这些材料看到，空心敌台一般采用“文字+序号”的方法进行命名。文字部分的内容具体又可分为三种：

〔图九〕“茨字叁号臺”匾（张保田2012年拍摄）



(1) 蔑视北虏+序号。第一种命名方式，目前在二镇中并无考古证据。康熙《山海关志》、光绪《临榆县志》有“靖卤一号台”等记载^②。而在河北西北部、山西、陕西等地则有较多实例，如“威远台”、“镇虏台”、“镇北台”等。

(2) 所属路名首字+所属关口名首字+地名+序号。“松(棚路)洪(山口)三峰岭五十六号台”；亦可见省略某一个或两个元素者，如“石(塘路)义(院口)窟窿山台”、“松棚路五十二号台”等。

(3) 以所属城堡名称首字+序号。如“茨(沟营)字三号台”〔图九〕、“浮(图峪)字十三号台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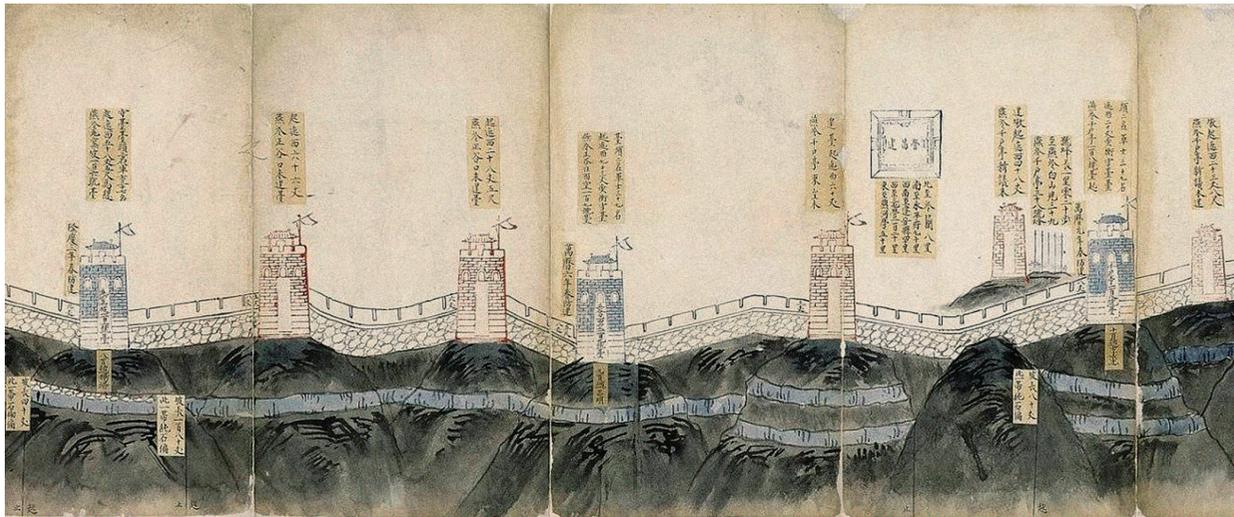
三种命名方式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。第(1)种据文献记载，仅见于山海关地区；第(2)种命名方式常

① 河北省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队：《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9年；华夏子：《明长城考实》，档案出版社，1987年。

② 董耀会等：《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·康熙山海关志》页16，中国审计出版社，2002年。

〔图十〕明长城蓟镇图冷口—建昌营段

图片采自长城小站论坛 (<http://www.thegreatwall.com.cn/phpbbs/index.php?id=95569&forumid=1>, 2008年) 网友“为您服务”2008年拍摄



见于蓟镇；而第(3)种，则主要在真保镇使用。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匾额实物，绝大部分发现于真保镇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1982年发现的万历《明长城蓟镇图》残卷，所见明长城敌台多标注有自名及建台时间，但将地图与实物进行对比研究的工作，目前并未开展。该材料是否能印证我们的观点，抑或是否存在反证，目前尚不得而知〔图十〕。

此外，“昌平镇”亦发现有敌台自名匾额2块，石刻4通。所见自名方式亦大体属于第(3)种，但又有自身特点。如有“川字一号”、“慕田拾台”¹¹等，或无“台”字，或为所属关隘的前二字+序号。与真保镇略有不同。但由于材料发现过少，不具有统计意义，仅列举以为“蓟州”、“昌平”、“真保”三镇分野的辅证。

（四）砖砌空心敌台的分期

明长城砖砌空心敌台，在建造完成之时，往往于台体内或附近树立刻有修台纪年的春秋两防、“阅视”、“鼎建”或“城工”碑。部分敌台在券门之上镶嵌纪年匾额，此外，台体用砖也多有纪年。这些材料是敌台的重要断代标尺。

据我们统计，目前在蓟、真二镇范围内发现的明长城砖砌空心敌台纪年砖石共计69通，其中22通与调查材料不能相对应，4通所属敌台形制不明，余43通所属的敌台形制比较清楚，属于大样本(n>30)，可以进行年代统计分析。在43通纪年砖石中，时代最早的立于隆庆四年(1570)，最晚为万历四十六年(1618)。

Aa型敌台发现鼎建碑4座，纪年为隆庆四年、五年(1571)、万历元年(1573)；

B型敌台共发现纪年石刻20通，文字砖2种。其中：

〈1〉 数据来源：长城小站“长城碑刻数据库”，<http://www.thegreatwall.com.cn/zhuanti/beike/DataBase/detail.php?id=254>，2003年。

Bb型Ⅱ式敌台纪年石2通，一通为万历二十二年(1594)，另一通为“万历甲口”，依万历在位时间推算，可能为甲辰(万历十年，1582)、甲午(万历二十二年)、甲戌(万历三十四年，1606)或甲子(万历四十六年，1618)；

Bb型Ⅲ式敌台纪年石1通，万历十四年(1586)；墙砖有“万历三十五年(1607)”字样；

Bb型Ⅳ式敌台纪年石1通，万历三十三年(1605)；

Bc型Ⅰ式敌台纪年石1通，万历二十年(1592)；

Bc型Ⅱ式敌台纪年石1通，万历二十三年(1595)；

BBc型Ⅲ式敌台纪年石14通，最早为万历十一年，最晚为万历四十六年；台砖有“万历十年”字样；

C型敌台发现纪年石刻15通，文字砖2种。其中：

Ca型敌台2通，万历四年(1576)、六年(1578)；

Cb型敌台11通，万历二年(1574)、四年(1576)、五年(1577)、六年(1578)、十一年(1583)；台砖有“万历六年”字样；

Cc型敌台2通，分别为万历五年、六年；台砖有“万历五年”字样。

〔表二〕明长城“蓟州镇”、“真保镇”砖砌空心敌台所见纪年砖石统计图表

	隆庆		万历																				
	4	5	1	2	4	5	6	7	10	11	13	14	15	20	22	23	29	32	33	35	36	46	
Aa	2	1	1																				
Cb				4	4	1	2			1													
Cc						2	1																
Ca							1	1															
Bc3									1	1	1		1				1	1			1	6	2
Bb3												1									1		
Bc1														1									
Bb2															1								1
Bc2																1							
Bb4																					1		

综上所述，我们在A、B、C三型砖砌空心敌台中均发现了纪年文字。〔表二〕中的数据显示，三型敌台各自所见的纪年分布均比较集中，并且具有早晚承接关系。据此我们将砖砌空心敌台分为三期：

第一期：隆庆四年至万历元年(1570—1573)，这一时期建造的敌台为木梁架结构；

第二期：万历二年至万历十一年(1574—1583)，流行中心室外回廊式敌台；

第三期：万历十年至明末(1582—1644)^{〔1〕}，这一阶段建造的空心敌台主要为券室通道结构。

另，Ca型敌台内部既有木梁架结构，又有回廊，兼具A、C型的部分特征，可能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形

〔1〕 碑刻中发现有崇祯十年碑记，但所属敌台形制不明。

态，但目前已发现的纪年文字过少，并不支持这一推断，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证实或证伪。

三 结论与思考

我们将文献所谓明长城“蓟州镇”与“真保镇”范围内的砖砌空心敌台划分为A(木梁架型)、B(券室通道型)、C(中心室外回廊型)三个类型、17个亚型。“蓟州镇”敌台类型齐全，并以B型为主；“真保镇”则以C型敌台为绝对多数；二镇敌台的自名方式也存在明显差异。通过明长城现存纪念石刻的分析，我们认为空心敌台的三个主要类型存在时代早晚关系：A型敌台集中修建于隆庆四年至万历元年，为第一期；C型敌台主要修建于万历二年至万历十一年，为第二期；B型敌台约出现于万历十年，修建年代至少延续至万历四十六年，为第三期。

另，考察范围内，目前已发表多部正式调查报告，关于华北明长城空心敌台类型的区域性研究成果很多^①，但多为类型介绍，较少有分期研究。目前，《明蓟镇长城1981—1987年考古报告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》)关于明长城砖砌空心敌台的材料最为系统详实。难能可贵的是，《报告》对蓟镇明长城进行了断代研究，将空心敌台分为五期，分别为：砖结构一至四期，以及砖木结构一期。其中砖木结构一期、砖结构四期、三期分别对应本文的一、二、三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的研究材料有很多正是来自于《报告》，而《报告》中砖结构三、四期与本文的二、三期早晚关系相反。究其原因，我们认为应当是对研究材料的使用方法不同所致。《报告》大量征引《明实录》、各地方志等作为敌台修建时代的断代依据，并以考古材料作为辅证得出结论。我们的研究方法则是从考古材料出发，先通过实物寻找规律，继而以文献作为辅证参考。方法殊异，而结论相反。这表明，考古学方法与文献史料的运用仍然有待整合。

明长城是比较特殊的历史遗存，作为考古材料，其优点在于遗存丰富，劣势则是地层简单，包含物少。此外，由于时代比较晚近，关于明长城修建的历史文献十分可观。如何针对这一类研究对象开展考古学研究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[作者单位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]

(责任编辑：项坤鹏)

① 鲁杰：《唐山境内明长城城墙的建筑规制》，《文物春秋》1998年第2期；晚学、王兴明：《浅谈明长城墙台的几种类型》，《文物春秋》1998年第2期；孟昭永：《明长城敌台建筑形制分类》，《文物春秋》1998年第2期；顾铁山：《浅析迁西境内明代蓟镇包砖长城的修造情况》，《文物春秋》1998年第2期；郑绍宗：《河北省明长城部分段落的考察》，《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页189—197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；吴克贤：《抚宁境内明长城敌台的建筑形制》，《文物春秋》2005年第3期；董焱：《延庆县长城的考察》，《教育科学》2011年第3期。高兴旺、林全国：《从金山岭长城看长城敌楼的建筑形制》，《中国文物报》2012年6月15日第6版。